

Michael Burawoy

# The Politics

资本主义和  
社会主义下的工厂政体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 生产的 政治

〔英〕麦克·布洛维 著

周滢 张跃然 译

沈原 校



文景

Horiz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 of Production

The  
**Politics**

# 生产的政治

资本主义和  
社会主义下的  
工厂政体

---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

〔英〕麦克·布洛维 著  
周潇 张跃然 译  
沈原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of **Production**

*Michael  
Burawoy*

生产的政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的工厂政体

[英] 麦克·布洛维 著 周潇 张跃然 译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单琪

营销编辑：高晓倩

封面设计：唐旭

美术编辑：安克晨

出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版：北京百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890mm × 1240mm 1/32

印张：13 字数：290,000 插页：2

2023年6月第1版 2023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79.00元

ISBN：978-7-208-18095-6/C · 67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产的政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的工厂政体 /  
(英) 麦克·布洛维 (Michael Burawoy) 著；周潇，张  
跃然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  
书名原文：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ISBN 978-7-208-18095-6

I. ①生… II. ①麦… ②周… ③张… III. ①劳动社  
会学-研究 IV. ①C97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248625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文  
景

---

Horizon



献给亚普

# 目 录

中文版序 1

序 言 19

引 言 把工人带回来 25

第一章 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 47

1. 导言 51

2. 资本主义控制：实质和表象 55

3. 阶级：自在还是自为？ 73

4. 技术：清白的还是污浊的？ 103

5. 总体：表达的或结构的？ 111

6. 美国的特殊性 126

第二章 卡尔·马克思与魔鬼工厂 136

1. 马克思的典型分析对象：市场专制主义 142

2. 兰开夏：从企业国家到父权制 147

3. 兰开夏：从父权制到家长制 156
4. 新英格兰：从家长制到市场专制主义 162
5. 俄国：移民工人和企业国家 169
6. 从魔鬼工厂到俄国革命 179
7. 反对《资本论》的革命 185

### 第三章 发达资本主义工厂政体的变动面向 189

1. 从专制政体到霸权政体 191
2. 杰公司和联合公司中的工厂政治 200
3. 生产机构和国家机构 214
4. 新型专制主义的兴起？ 233

### 第四章 工人在工人的国家里 240

1. 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 244
2. 红星拖拉机厂 258
3. 工厂政治的多样性 283
4. 国家社会主义下的阶级斗争 303

第五章 欠发达的隐蔽之处	314
1. 欠发达理论中的生产与政治	316
2. 从原始积累到扩大再生产	324
3. 劳动过程与殖民遗产	332
4. 殖民专制主义的兴衰	340
5. 劳动过程与生产机构的分离	354
6. 从生产政治到国家政治	362
7.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转型	369

结 论 迈向全球视角	375
------------	-----

索 引	399
-----	-----

后 记	405
-----	-----

## 中文版序

能得到邀请给 35 年前出版的《生产的政治》一书的中文版写序言，这让我感到十分荣幸。这样一本年代久远的著作还有什么价值？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变得不过时？书中的思想是否能被延展到当下的现实中？

让我们首先回到 1985 年。那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正迎来一次复兴。我坚定地支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议程——今天依然如此，但却不是以一种机械或教条的方式，将马克思或其他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著述看作是永恒的真理。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不断地重构马克思主义，使其能够解释持续变动世界中那些原先不能被解释的异例。如果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变化会导致观念的变化，那么马克思主义自身也要不断发展。如果马克思主义试图为世界的变迁提供某种指导，那么随着世界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自身也要改变。一个跨院系、跨学校、跨国界的马克思主义者群体应当发展起来，这个群体的使命便是不断重构马克思主义，使其能够回应时代提出的挑战。在不同的地方，这个群体关心的议题不同，依靠的马克思传统源流也不同。在有些地方它

更偏向理论，在另一些地方它更看重实践。

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更多地限于学术界之内，尤其在社会学中积累起不小的能量。在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解答的问题中，有两个问题尤其吸引了大量关注和精力。第一个是关于工作的组织，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劳动过程。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的《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一书尤其激发了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并带我们重新回到了《资本论》第一卷（*Capital, Volume 1*）。布雷弗曼考察了劳动过程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变迁，认为工作形态变迁的轨迹体现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概念和执行的分离，这使资本家获得了更多控制力和利润。通过工作的去技能化，资本能更为有效地规制工作过程，同时降低劳动成本。第二个问题聚焦于国家及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兴趣，是被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他将国家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和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他将国家看作是具有相对自主性的一种结构，是保护资本主义既不被资本家破坏也不被工人破坏的必要条件）之间的辩论推动起来的。

《生产的政治》一书试图将这两方面的问题连接起来。我试图同时向劳动过程理论和国家理论提出挑战。对于劳动过程理论而言，我的贡献在于指出生产场域除了工作本身之外同样也是政治场域，其自有一套规制模式，形塑了生产环节与其他环节的斗争。对于国家理论而言，我的贡献在于指出国家并不

是唯一的政治场域，生产场域的支配关系恰恰是国家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生产领域的政治是塑造国家与劳动过程之间关系的重要环节。我进一步指出，这一生产的政治有其自身的“内部国家”，或者说“生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机构”，它既是阶级斗争所形塑的对象，也在规训和限制着阶级斗争。

概念创新始于理论与实践的交汇处。在芝加哥大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训练之后，当时还是博士研究生的我在南芝加哥的阿利斯-查默斯工厂（Allis-Chalmers）找到一份机械操作工的工作。这个工厂是美国三大农业和建筑设备制造商之一。这既是我博士论文研究的对象，也是我生计的来源。在那个年代，有工会组织的蓝领工人拿的薪水不亚于一名大学助理教授。如果算上加班工资，我比我的一些老师们挣得还多。

在工厂中，我惊讶于工友们在工作时是多么努力，并感到很纳闷：为什么他们如此努力地为资本家的利润卖命？虽然布雷弗曼描绘了工作的组织结构在客观层面发生的变迁，但他并没有分析工人在主观层面对此有何反应。既然去技能化的工作如此没有意义，工人们为什么还工作得那么努力？我所看到的情况似乎和马克思在 19 世纪描绘的情况不同：驱使工人努力工作的动力，似乎并不是经济层面的市场强制力量或是对失去工作的恐惧。这一动力也不像经济学家们说的那样来自奖金等物质刺激。我在 1979 年出版的《制造同意》（*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一书中所讲的故事要更加复杂。工作场

域中的客观限制并不像布雷弗曼预设的那样令人窒息，而是为工人们留出了自己为工作赋予意义的空间。为了减轻工作时的辛苦感和无聊感，工人们将工作建构为一种游戏，这种游戏有自己的规则，被工人们共同认可和执行。

但生产场域包含的不只是工作本身。一系列规制机构为赶工游戏确立了条件。三种规制机构对确保工人努力工作而言尤其重要。首先是内部劳动力市场，其允许工人竞争空余岗位，一般是资历最老、相关经验最丰富的工人胜出。这样一来，工人们在工厂中待的年头越久，在厂内的位置也越高，工资也就越高。其次，工人们被建构为拥有权利和义务的个人主体，这些权利和义务靠申诉机制执行。如果管理方违反了集体谈判合同中的条款，工人们可以通过工会层层向上发起申诉。最后，工会代表工人和资方进行集体谈判，视工厂的盈利情况而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福利待遇。不管是在个人层面还是集体层面，工人们都有充分的理由努力工作，而无需持续的持续干预。

我借鉴了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用来分析宏观政治的“霸权”这一概念，将我所看到的景象称作霸权式的生产政体，这一政体将工人对资方的认同组织起来。我指出，这一生产政体是区分发达资本主义和早期竞争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高薪、高福利、工作稳定性这几个条件加在一起，使得管理者不可能再用强制手段逼迫工人努力工作，他们必须说服工人努力工作。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事情很快会发生重大转变：在国家的引领下，资本家向工人阶级展开进攻，

使得工人与工会屈服于市场，一种新的生产政体即“霸权专制主义”出现了。我在《生产的政治》中提出了这一预想。

我的批评者们笑了起来：你只不过是研究了一家工厂，如何将结论推广到整个发达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使我开始对不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政体做比较研究。瑞典、日本、英国的生产政体都是霸权政体的变种，其具体类型取决于国家对生产的规制及其在生产场域之外提供的福利。为了确认各种霸权政体的共同特征，我将其与马克思笔下的19世纪专制生产政体比较。我的研究显示，在马克思所描绘的专制政体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专制生产政体。专制生产政体的具体类型，一方面取决于劳动过程，另一方面取决于19世纪的国家形态。从历史文献中，我发掘出一系列存在于美国、英国、俄国早期纺织业中的市场专制生产政体：企业国家、父权制、家长制等政体，并试图理解这些生产政体得以存在的条件及其对形塑阶级斗争的后果。

我的批评者们再次笑了起来：这与资本主义无关，不过是工业化导致的结果罢了。我因而重新审视了自己早先（1968—1972年）对赞比亚铜矿行业所做的研究，并指出这一行业中存在另外一种专制生产政体，即一直持续到后殖民时期的殖民专制政体，或者说殖民主义在后殖民时代的再生产。可我的批评者们还是不满意：非洲的工业化进程本来就落后。这样一来，我非常清楚自己必须要做什么：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工厂，并揭示其中的生产政治与资本主义社会有本质不

同。我一直很想去中国做研究，但我知道这超出我的能力范围。另外，我对1980—1981年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十分着迷，这个运动就像突然冒出来一样，尝试去重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我收拾好行装打算去波兰，但还是晚了一步——雅鲁泽尔斯基将军（Wojciech Jaruzelski）行动得比我更早，他在1981年12月13日宣布戒严。团结工会转入了地下，直到1980年代末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面目重新出现，参与到有关资本主义转型的谈判中。

在我不得不向团结工会说再见之后，我的朋友、也是我未来的同事塞勒尼（Iván Szelényi）邀请我陪他于1982年夏天去匈牙利，这帮了我大忙。这也是塞勒尼自1976年开始政治流亡之后第一次返回匈牙利。在此之前，米克洛什·哈拉兹蒂（Miklós Haraszti）对匈牙利一家机械工厂中种种磨难的动情记录早已激起了我的好奇心<sup>[1]</sup>。在他的笔下，机械操作工完成的工作对我而言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同时操作两台机器。这是为什么？我之前一直以为，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争取到了什么权利的话，那就是不用辛苦工作的权利！和塞勒尼同去匈牙利的十天震撼了我的世界。在此之后，我决定在匈牙利开启我的下一段研究旅程。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在社会社会主义工厂中找到工作——那是工人国家中的神圣领地，即使对本国的研究者也是严防死守，更别提来自外国的持批判

---

[1] Miklós Haraszti, *A Worker in a Worker's State*,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77.

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但当时正值匈牙利的改革年代，我还是无所畏惧地在 1983 年的夏秋之季前往匈牙利做研究。靠着朋友们的帮助，我在一家香槟工厂和一家合作社的纺织工厂找到工作。接着，我在 1984 年进入一家机械工厂，那家工厂与南芝加哥的阿利斯 - 查默斯厂以及哈拉兹蒂笔下那家布达佩斯的工厂都颇为相似。我之后又从那家机械工厂跳槽到了米什科尔茨（Miskolc）的列宁钢铁厂（Lenin Steel Works），这家工厂堪称匈牙利工人阶级的核心。在 1985—1988 年间，我有段时间在这家工厂当熔炉工。

所以我是这样回应我的批评者的：国家社会主义造就了一种独特的生产政治——官僚化的生产政治，资方、工会、党组织作为国家的延伸部分在其中相互合作。这种官僚化生产政体处于一种独特的生产过程和一种独特的国家形态之间，带来了非常真实的后果。与资本主义经济体时常陷于系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不同，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面对的危机来自于短缺：劳动力、原材料、机械设备等等的短缺。为了应对具体生产过程中短缺造成的困难，就需要一种灵活的工作组织形式，需要工人对生产过程至少有某种程度的集体控制权，虽然时常会遭到武断的官僚管理的阻挠。

在生产过程之外，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又是怎样的呢？与惯于将剥削过程神秘化（模糊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国家社会主义之下的剥削过程是非常透明可见的，因此需要被正当化（合法化）。所以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国家比在资

本主义国家要重要得多。与其他国家一样，社会主义国家也宣布，国家代表所有人的共同利益，社会主义是高效和平等的，但在一些国家，工人们实际看到的是遍地的低效和不平等。工人所做的其实不外乎是呼吁国家兑现其做出的承诺。通过揭露国家的言行不一，工人拥抱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批判立场。合法性的失败导致集体抗争行动时常爆发，并在一些情况下导致国家公开使用暴力。在国家社会主义之下，强制与同意在历史中不断交替；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霸权生产政体中，强制与同意共存，强制保证同意的实现并且自身也是同意的对象。

我原以为这一动态中孕育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未来可能性，那种可能性是我在团结工会所发起的革命中直观感受到的，虽然团结工会运动自己给自己施加了许多限制。但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匈牙利工人对社会主义话语的运用只是表面现象，他们对任何社会主义未来的犬儒心态要根深蒂固得多。他们对社会主义现实的批判将他们引向了资本主义，而非民主社会主义。当国家社会主义在 1989 年崩溃时，有工人试图重建 1956 年匈牙利革命时曾出现的那种工人委员会，也有工人试图掌管工厂，但这些毕竟是工人中的少数。大多数工人都愿意在资本主义中找找机会，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意味着工厂的关闭、福利保障与社会安全网的泯灭、免费教育的消失和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的终结。我的匈牙利工友们当时并未意识到共产主义正在成为“辉煌的过去”——这正是 1992 年我与亚诺什·卢卡奇